

# 天下無不是之學運！

## 「聯俄容共與西山會議」讀後感

●唐德剛（史學家、大學教授）

### 為求恍然大悟執筆

記得那還是五十年代的末期，雷震先生在台灣創辦〈自由中國〉的時期，那時身任該刊發行人的胡適之先生，要我們一批美國留學生，替自由中國「寫寫稿」作為精神支援，三句不離本行，我也就應命在自由中國上，寫了幾篇史論文章，其中一篇就叫做〈論西山會議派〉，該篇也在當時，我們在海外自辦的，並與〈自由中國〉結為「姐妹刊」的〈海外論壇〉上，同時刊登的。

「西山會議派」，這個中國國民黨中最古老的一個派系，我在孩提時代就耳熟能詳了，慚愧的是，我還跟著過一些是我父執長輩的青少年們，喊過「打倒反革命的西山會議派」的口號呢，西山會議派是

什麼個東西？我們又為什麼要「打倒」它？當時的我當然一無所知，但是它在我的印象之中，是個應該打倒的壞東西，我則未嘗懷疑也，一直等到抗戰中期，我在重慶上大學，讀了歷史系之後，才恍然大悟。因此在五十年代，為支援〈自由中國〉，我才對這個，有疑處不疑的口號，在胡適老師，不疑處有疑的感召之下，十分感慨地，寫出那篇〈論西山會議派〉的短文，把那個「歷史反革命」的，國民黨元老集團，稍事平反。

最有趣的，我記得還是在六十年代之初，我在紐約第一次遇到從台灣來美國訪問的夏濟安教授（夏志清教授的長兄），夏教授說，他對我真是「久仰，久仰」了。因為他是我底「忠實的讀者」，「五體投地」，云云。原來他在〈自由中國〉上

讀過我這篇論西山會議派的文章。他幼年在蘇州時，和我一樣，也喊過不知多少遍「打倒反革命的西山會議派」。可是就不知道「西山會議派」是什麼個壞東西。一直等到他在〈自由中國〉上讀到我底「大作」，才「恍然大悟，恍然大悟」的。

其實同夏教授和我一樣，我們從革命口號中長大的這一代的老青年，當然包括我自己，在讀過自由中國上的拙文，而「恍然大悟」的，還不知有多少人呢。他們之中，有許多也都和夏教授一樣，向我說過「恍然大悟」類的話，我自己事實上，也就是為著追求這個「恍然大悟」，才執筆的。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又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胡適老師所說的，不疑處有疑，原是我們搞歷史這一行中，扳搖不動的信條

君不見，最近數十年來，數千萬人頭落地，屍骨堆山，血流成河的現象，不都是有疑慮不疑的瞎口號，瞎信仰和瞎指揮，所聯合造成的最可怕的後果。胡適說，「辯冤白謗」原是讀書人，尤其是歷史家所最應該做的事。其作用正在此。

### 辯冤白謗談何容易

可是把不疑慮有疑的各種冤案，都能辯冤白謗，搞到「恍然大悟」的程度，可不是一樁容易的事體呢。筆者所寫的那篇，使夏濟安教授和我自己都「恍然大悟」的拙作，我這個作者對我自己的拙文，有時還在不斷的不疑慮有疑呢。原因是，筆者小可算老幾？我怎敢說，我那篇〈論西山會議派〉的急就章小文，就能把「西山會議派」這個歷史上的大題目，下了「定論」呢？不用說我沒這個主觀的資格；客觀的原始史料，和客觀的，徹底的歷史研究（所謂 exhaustive research）的學術環境，都還沒有出現呢。筆者不學，那能就根據一些不全的史料，和不徹底的歷史研究，就遽下「定論」呢？因此筆者那篇小文，也只能算是一篇「大膽的假設」，和拋磚引玉的一點小嘗試。它的是否有當，還

有待於，今後繼續出現的史料，和更徹底的史著，來加以「小心求證」，然後才能肯定，或否定呢。當然不論肯定或否定，都不是言之無物，說空話所能決定的。它是要在 Exhaustive Research 之後，才可以大致作其結論，而這項結論，縱遲至目前，也還嫌條件不夠呢。但是這個時代，卻一天天地迫人而來，問題遲早是會解決的。為期不遠也。這也就是筆者不揣淺薄，常時提到的所謂「文化轉型」，和學術自由的問題了。文化轉型，總歸有個終結的時期；學術自由的到來，也是個歷史的必然，遲早而已。

### 諸子蜂起的現代版

我國近百餘年來，文化轉型最顯明的趨勢，也是任何人和事所不能逆轉的趨勢，那便是學術研究，要從「一言堂」的鐵框框之內再度衝出來，從證明一家真理的歷史研究，轉向尋找百家說理的道路上來……根據近年來海峽兩岸三地，學術研究的大風向來觀察，一個嶄新的學術運動，正迫人而來。不特自然科學在中國要大放異彩，文史哲和一般社會科學和行為科學，都要大放光芒，為過去兩千年之所未有

。其多采多姿，將遠超過二十世紀初期那個〈五四運動〉。因為五四運動從學術觀點來看，只能算是個「啟蒙運動」（The Enlightenment Movement）；在西學東漸的衝激之下，運動量至大，而內容（所謂科學，民主，所謂新文藝，新思想，包括社會主義思想，和共產主義思想）卻十分膚淺的啟蒙運動，介紹運動而已。

今後這個勢必到來的，新的學術運動，則是五四後，經過百餘年的醞釀與融和，由東西兩大文明的長期交配，而滋長出來的一個新的文化轉型運動，一個真正的中國式的〈文藝復興〉（a real Chinese Renaissance）。胡適之先生曾把五四前後所發生的〈新文化運動〉，說成〈中國文藝復興〉，那是虛張聲勢，言過其實。一個真正的〈中國文藝復興〉，看趨勢，應該發生在本世紀，二十一世紀的中葉。現年未逾半百的幸運朋友們，當能躬逢其勝也。它底必然到來，不是任何主觀客觀的人與事，所可逆轉的。它之駕臨吾土，是個「歷史的必然」。信不信，且待即將到來的歷史事實，來加以證明嘛。

但是這個新的文化運動之到來，它不會像在〈五四運動〉時代，那樣幼稚的搖

旗吶喊。它會像曾國藩所說的：「得富貴如登高山，不知身之自高也。」那樣「不知身之自高也」的慢慢發展到最高潮的。朋友們，相信嗎？這個不知身之自高的文化爬山運動，現在正在起步，正在起步。它要再爬四五十年，猛然回頭一看，才覺得宇宙之廣闊，自身之高聳，而心懷大暢……朋友，您要了解這一意境，不妨去問問，高段職業爬山客（professional mountaineers），他們就會告訴您，他們何以愛上了「爬山」，我國文明中最光彩的「百家爭鳴，諸子蜂起」，那一段，歷時數百年。它是從那個搖旗吶喊的「愛國運動」搞起的呢？它是得富貴如登高山，不知身之自高也，慢慢地爬向高峰的。我們這個眼看即將到來的另一個文化運動，便是兩千年前諸子蜂起的現代版。這也是筆者個人所經常說的，「中國政治社會文化第二次大轉型」，反映在文化上的現象是也。這是個歷史的必然，任誰也不能逆轉也。

### 歷史考驗論定標準

在這個即將到來的文化高潮裡，歷史學必然是「百花」之一，其艷逐群芳，今日已可略見端倪了。在這一新的史學潮流

裏，〈西山會議派〉這個史學題目，必然也是將來「博士生」，選擇的重要對象之一，是無可置疑的。在一本有功力的博士論文裏，則「西山會議派」是否是個「反革命集團」，參加「西山會議」的國民黨諸元老，是否就是「歷史反革命」，就如胡適之先生所說的，第一，就要「靠證據說話」了，證據確鑿，則誰也無法替他們平反，證據不足，則任誰也不能胡亂污蔑。第二，則是「革命」一辭定義的問題。什麼叫做革命？什麼又叫做反革命？第三，縱使把革命的定義說清了，那麼「反革命」，究竟又算是什麼個罪惡呢？最近海峽兩岸，不是都把「反革命」這條罪狀，從刑法上廢除了嗎？那末寫歷史的人，又怎能不「重行估定一切價值」，把不疑處有疑的歷史，來重行改寫呢？

我國傳統歷史家臧否人物，有所謂「蓋棺論定」。一個善變的歷史人物，像汪精衛那樣，他一旦死了，不能再變了，就可以對他的功過下結論了。可是也有歷史家認為，蓋棺還不能論定，因為歷史人物

，生前難免都有其恩怨的，像兩蔣一毛，像劉少奇、林彪和鄧小平，生前都恩怨太大。他們身雖死亡而恩怨未盡。感其恩者

，就要大造其紀念堂，不時謁陵瞻拜，感恩泣血。怨大者，則咬牙切齒，恨不得把紀念堂改為公共廁所，及早鞭屍，所以一個歷史人物，恩怨未斷，又豈能論定哉？其實上述兩項，都只是屬於一種，人事恩怨的主觀思想，在政治上說，不足為訓。在哲學上說，也不值得重視。因此以社會科學法則治史的現代史家，對一個歷史人物，乃至一樁歷史事件（像〈西安事變〉）的評價，則要看該人物的思想行為，和該事件的影響，是否經得起歷史的考驗，就以毛澤東主席為例吧，他老人家生前被叫成「偉大的統帥，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叫翻了天了。但是在毛氏漸漸向歷史的海洋下沉的時候，歷史家再回頭看看，毛氏這四條生謚，和他一生的所作所為，符合不符合呢？這就叫做「論定」了。如此，則毛氏不特蓋棺不能論定，恩怨盡時，也還是不能論定的，只有在歷史發展的長期的考驗之下，才能慢慢地，顯現出比較公平合理的「定論」來。

歷史人物如此，歷史事件亦然。例如〈西安事變〉這樁歷史事件，由於當事人的恩怨未盡，論者至今還是兩極化。但是

這樁歷史事件，不特改寫了中國現代史，也改寫了世界現代史，因此歷史家對它的評價，就不能單從兩人的功過，乃至兩黨的恩怨立論了。要說明其所以然，就要從宏觀史學的方面，來加以透視，且看它在事前的歷史發展上，究竟發生了什麼樣的作用，再來加以詮釋了。因此，只有時間和歷史的考驗，才是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作「定論」的，最可靠的依據呢。時候未到，言之過早，就難免於歪曲了。

### 反左防左的老祖宗

西安事變如此，西山會議亦然也。因此筆者當年對〈西山會議派〉，作「恍然大悟」的追求，只是一種對此一歷史事件底「真象」的追求。但是作這種追求的「真象史學」(Factual History)只能算是整個歷史研究中的起步，小兒科而已。因為你把歷史的真象弄清楚了，又意欲何為呢？證明些什麼呢？(What do you want to prove?)所以更重要的還是第二步，這真象在歷史的演變上，說明了些什麼？和證明了些什麼？要知道這「真象」說明了些什麼，證明了些什麼？那就不能單看它，

立竿見影的，「立刻後果」(immediate result)了。它需要數十年，甚或更長時間的考驗與觀察，才能見其歷史真義，和功過是非之所在也。

且看西山派，他們這批「總理的老朋友」，中山最原始的追隨者，他們是從反對孫中山「向左轉」和「以俄為師」的國民黨新政策，新方向開始的。中山個性倔強，因此中山在世時，他們只有暗中搖頭，不願明目張膽的「反左」。中山也有知人之明，他知道這些老同志有「反左」傾向，對他們也就尊而不親，敬而提防了。此後他對這些老同志，雖然一個個都還依舊「圈」入改組後的中央委員會，但是新黨章卻規定「總理有最後決定權」，這樣就把黨魁獨裁化了。獨裁者再以個人權力，另組革命委員會、政治委員會、中央政治會議等，一類的小組織，來代行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職權，如此一來，中央委員會就變成個空殼子了。身為中央執行委員的元老們，也就一個個被架空，一個個被迫靠邊站了。以至國民黨在二十年代初期改組之後，就變成個「左派」當權的，另一種革命黨了。

可是中山一旦物故，黨內再無第二個

享有最後決定權的獨裁總理，這伙原在中央委員會裡占絕對多數的「老同志」，立刻就圖謀恢復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權力，黨內就難免發生了左右之爭。但是經過中山生前刻意栽培，以汪、蔣為首，以中生代跨黨分子為骨幹的「左派」，這時在國民黨的黨政軍系統內，已根深蒂固。這個以俄國顧問鮑羅廷為後盾的左派，因此也就時時刻刻存有「清黨」之心，要把這批元老，乾脆清除出黨，以免他們在繼續向左的革命道路上，絆手絆腳。就在這個劍拔弩張的關口，左派重要領袖之一的廖仲愷，突於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被刺身死。

這宗所謂「廖案」的凶手，雖至今尚不知是誰，但是廖案卻變成個天大的口實，讓以汪、蔣為首的左派，把反左派，元老派，和一般他們心目中的所謂右派，一舉加以清除，其清除之徹底，連德高望重的胡代帥，也在所不免。胡漢民原是中山北上時，欽點的「代理大元帥」。可是中山逝世後，設在廣州的大元帥府卻被改組為〈國民政府〉，那以「革命的向左來」為號召的汪精衛，也就乘機篡奪了胡代帥的寶座，當上了國府主席，胡漢民也就被

迫下崗，靠邊站了。迨「廖案」發生之後，胡氏之黨，頗受嫌疑，以故胡氏被迫，在廣州也無存身之所了。此時連胡漢民在廣州都不能見容，則謝持、鄒魯、張繼、林森等元老，就更無立錐之地了。因此在汪派控制之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裡，就由少數派當權，與蘇共，中共相表裡，國民黨政權，就變成個全左的天下了。

這時黨內的多數派不服，他們在廣州既然不能立足，乃成群結隊的趕往軍閥治下的北平西山，總理停靈之所，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下旬，召開其「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其目的則是糾偏，反左，和恢復中央執行委員會應有的權力，這就是所謂〈西山會議〉了。當然他們的人數也有十餘人，約占合法中央委員的半數，但其中搖擺不定者，也大有人在。可是西山會議雖不能算是中央委員會，但是與會者都是極有影響力的建黨元老，自有其高度的代表性，因此他們也就形成一個強有力的，以反左，反共相號召的黨內反對派，這就是所謂〈西山會議派〉了。

自此以後，中國國民黨，乃至全中國之內的革命運動，政治運動，群眾運動，社會運動，以及一般文化運動（包括新思

想，新文學，新藝術），也就壁壘森嚴的分為左右兩派，而兩派的鬥爭，至今綿延未息。血流成河，屍骨堆山之餘，最後竟至十二億同胞，簡直無一人可以置身事外，其為禍之烈，真是罄竹難書，朋友！這結果毋待細述吧。

但是千禧年後，新世紀中的歷史家，如把近七十年來的民族慘史，從頭到尾的，心平氣和的，清理一下，在萬惡之源的左右派鬥爭之中，我們如果拿血淋淋的人頭，來分別統計一番，則左派為禍之烈，實遠非右派可以望其項背吧。朋友，這也不算是對左派的栽贓吧？直至今日，縱在大陸，防左反左，仍是當國者的中心任務。這也不算是危言聳聽吧。而當年國民黨裡的〈西山會議派〉，無意之中，歪打正著，卻變成這項，反左防左運動的「史太君」，「老祖宗」，可笑吧！

七十年來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今日的歷史家再把〈西山會議派〉，拖出來，再論，三論一番，史實真象之外，該有另一種的歷史意義吧，所以筆者才敢斗膽的說，評論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蓋棺不能論定；恩怨盡時，也不能論定。評論歷史人物，歷史事件，要經過長期

的歷史考驗，才能下個大致不差的結論，〈西山會議派〉的歷史，就是個活生生的例子。這項愚者一得，不能算太錯吧。

### 有善足陳無惡可隱

西山會議派既然是我國現代革命史上最的防左反左的派系，它一開始便是國共兩黨當權派杯葛的對象。國民黨在民國十六年「清黨」以後，尤其是九一八事變之後，對西山派裡的部分「老同志」，謝持、鄒魯、居正、林森、張繼等等，雖然是恢復了尊而不親的老傳統，林森竟然在汪、蔣的對峙中，被踢上層樓，當了國家元首，但是西山會議派，算是個沒有派系的派系的歷史，還是碰不得的。西山元老，儘管都是一些有為，有守，有相當學問的老知識分子的老革命家，差不多每個人，也都有其自述，年譜，日記一類的著作。但是在他們有生之年，他們自己，和他們有些很不平凡的第二代。寄居兩岸三地，甚至遠在歐美，對黨爭往事，也還是欲言又止的。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當事人都死在蔣、毛二公之前，西山會議的前因後果，牽涉的恩怨太多，在蔣、毛治下，就未便多言了。

再者，國民黨聯俄容共的政策，原是孫中山所親自制訂和領導的。歷史性的反左反共，難免就牽涉到孫中山。而孫國父在北伐之後，已經被神化了。西山諸公原是黨國元老，如今雖靠邊站，究竟不失尊崇，對那段不愉快的往事，能忘記，也就忘記了。所幸時間是最公正的，歷史也是永遠毀滅不了的。蔣、毛的時代一旦落幕，而西山會議本身也已逐漸和堯丘之盟，鴻門之宴，等等歷史名詞，同其遙遠，恩怨已斷。加以在毛治時代，全民呻吟於極左派「封建法西斯」的淫威之下，刀山油鍋，皮開肉綻，如今痛定思痛，想起當年反革命的西山派，生薑還是老的辣，實在是頗具遠見，和政治智慧。好事的歷史家，和若干不甘祖宗委屈底當事者的後裔，冷飯熱炒，〈西山會議派〉就變成一宗純學術性的歷史研究底熱門專題了。

前不久，我曾聽到，前西山主將之一，鄒魯先生的研究已被選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論文的專題。鄒魯縱在抗戰末期，仍是國民黨中常會中以反蘇反左反共出名的極右派。一九四五年八月，「中蘇條約」擬訂時，鄒魯也是唯一公開反對的元老。鄒氏今日居然也是大陸上

史學博士生，專題研究的對象，則今日在大陸上的博士生，還有什麼史學專題，不能突破呢？

筆者個人在學術著作中，是最看重所謂「博士論文」的，因為一所在國際馳名研究機構的博士論文，往往都是，該專題底最嚴肅，最認真的 Exhaustive Research。其博士論文大都不會自砸其招牌的。我相信該所的學術標準，吾正引領以待這本鄒氏新著之面世也。

更可喜的則是我近日又曾熟讀了一部，與另一西山主將謝持先生有關的原始作品：謝幼田撰，〈聯俄容共與西山會議〉長篇鉅著的原稿。謝君的大著雖非博士論文，但是在新史料的運用上（如新近解密的蘇共檔案，和久被國共兩黨所疾視的謝持等諸元老的日記等，私家文獻），所下的工夫，也是十分可觀的。如果像這樣的學術著作，一部部的寫下去，則久為史學禁區的西山會議派的歷史，很快的，就會真相大白於天下了。

當然我們史學界同行的評論家，可能會說，謝君之作，也不脫當事人後裔著書，為祖先辯冤白謗，難免於隱惡而揚善，因為作者是謝持先生的孫子。著書揚祖，

怎能不有所偏呢？然余細讀全稿，倒覺得問題不大，作者有時雖然也筆端常帶感情，但是隱惡揚善，實無足重輕。因為這些老革命，當年為著救國救民，而拋頭顱，

洒熱血，都是一些在革命烽火中倖存的仁人志士，未得與其他先烈，埋骨於黃花岡上者，幾希？重要的是，在國民黨奪得政權之後，他們又始終只是一批靠邊站的元老，未嘗當權也。歷史家如細查他們各個人生平事跡，每人除在青少年期，難免也有若干，英雄好色的青年病之外，也只是有一種有善足陳，無惡可作的人物。他們的子孫，縱有志欲為祖先，隱惡而揚善，實在也只是一種小兒科，問題不大也。質諸史界同文，是耶？非耶？

### 世界革命義始利終

因此，謝君之作，終究不失為西山會議派傳統的反俄反左的一家之言。尤其是作者掌握了近年來，由於蘇聯解體，才隨之解密的，一二手俄共新史料。據此而得的新觀點，舊結論，雖與老西山派一脈相承，但是所提出的「證據」，則豐富多矣。原來，在西山派元老謝持，鄒魯等生前，作防左反左運動最力之時，他們總把第

三國際，和蘇聯政府的代表，在華所從事的地下活動，和公開宣傳，一概說成是，赤色帝國主義，在中國搞顛覆和侵略活動的新陰謀，其實質與其他白色帝國主義，並無兩樣。這些話在當時，不特那些有強烈殉道精神的左翼革命家，不能接受，一般公平的歷史家和政論家，對之也有極大的保留。

列寧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潮。我們受盡帝國主義之苦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次殖民地中的受害人，對列寧這句教導，原是刻骨銘心的。所以在十月革命之後，莫斯科立刻就變成世界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反殖民主義革命的中心和聖地了。一時全世界的革命志士，前往朝拜，受教，參加革命的，真是風起雲湧，多如過江之鯽。歷史家怎能把這種革命高潮，與傳統的西方帝國主義等量齊觀呢？

可是，從俄國十月革命完成之後，八十年來的世界革命史，卻又毫無疑問的證明了，赤色帝國主義，或社會帝國主義，為禍之烈，實在是有甚於傳統的白色帝國主義，至少二者是一丘之貉，不相上下。不特謝君之書上，有舉不完的鐵證如山，我們試看二戰期中，蘇聯與德國的瓜分波

蘭，滅人小國；和二戰末期之謀我滿蒙新疆，強「租」我旅大，奪我中東和中長鐵路，把中國逼回義和團時代之種種惡行，真是罄竹難書。解放後北京和莫斯科，蜜月未幾，蘇聯的帝國主義的嘴臉，又畢露無遺。中國人民被迫對蘇備戰，和銜恨之深，固有甚於前朝。（社會帝國主義）這個新名詞，便是從北京叫出來的。一個革命聖地，社會主義的祖國，忽然有自我作賤，又變成了，另一種更壞的帝國主義，這又是什麼回事呢？

其實，朋友，沒啥深文大義也。這只是基本人性中，最自私，最可恥的一面而已。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這是在沒有私利影響之下，才會出現的公德心。一旦私利大於公德，則人類就既無惻隱之心，更無羞惡之心了。一個人或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為著私利，而失去了「惻隱之心」，他就會變成最殘酷，最凶狠的野獸了。在相同情況之下，他如失去了「羞惡之心」，那他就會變成，世界上最無恥，最不要臉的流氓，惡棍和強盜了。白色帝國主義如此，赤色帝國主義亦然也。資本帝國主義如此，社會帝國主義亦然也，只是資本

帝國主義，夫子自道，從不隱瞞，它是為自私，攘利而來，是個「真小人」社會帝國主義，則善於唱高調，口口聲聲，為的解放弱小民族，為的解放被壓迫階級，其結果卻變成，口是心非，以義始，而以利終於「偽君子」而已。這原是最自私的人性中，最醜惡的一面，也不能獨怪於社會帝國主義。

孟子告訴梁惠王說：「王何必曰利，唯有仁義而已。」可是口口聲聲的唯利是圖的「真小人」，還不失其為誠實。那些滿口仁義道德，一肚皮男盜女娼的「偽君子」，其腐蝕人性，和為害社會之大，就遠甚於誠實的小人了。俄國人當年主導世界革命運動，終於變成了社會帝國主義，而最後弄出蘇聯解體的下場，實是人類歷史上一齣最大的滑稽鬧劇。毛澤東主席在中國當政時代，那種「完全為人，毫不為己」的天大牛皮，至今仍然言猶在耳，餘音繞梁，誰知老毛一死，老婆立刻被捕，所謂毛澤東思想和共產主義也就被鄧小平裝入了垃圾膠袋一去不返了呢？這也不是五千年中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鬧劇、醜劇和滑稽劇哉？胡為乎而然呢？朋友！說穿了，不就是這個「以義始，而以利終」

的人性弱點，過分發展底可悲下場？

西山會議派裡，當年那些老頭子們的  
反左運動，和現在的歷史相印證，豈不是  
歪打正著？因此，謝君近作，正是衝著這  
一計極有教育意味的歷史事實，根據最新  
的史料，而作出個極有條理的斬新的紀錄  
。我輩讀史，治史的史學老兵，撫今思昔  
，能不感慨萬千？

### 極左極右萬惡之源

記得去歲初夏，筆者正在北京參加一  
項學術會議，事有巧合，正逢十萬北京學  
生，為著美機錯炸駐南斯拉夫中國大使館  
，而走向街頭，大搞其抗美援南運動。筆  
者本在街頭旁觀，卻被一偶然機緣，捲入  
此一怒潮，而觀禮到底。事後北大、師大  
裡的朋友們，問我對此事的觀感。我則認  
為「天下無不是之學運」。我對任何一種  
學生的愛國運動，都是愛護到底的。因為  
青年人的群眾運動，其動機都是善良的，  
可愛的。但是群眾運動過火了，往往都會  
走向極端。不是像當年蘇俄和毛公的極左  
，便是像德意納粹和法西斯的極右。兩者  
都會出大毛病的。我國社會發展，今日尚

在脆弱的「轉型」中期，左右搖擺不定。

美國今日，由於最基本人性的弱點，由嫉  
華、恐華諸多社會心理所釀成的，反華最  
劇烈的極右派，也正在乘機起哄。中國由  
於毛主席的幽靈未滅，一個極左的潛力，  
也時時要死灰復燃。中國的極左如果和美  
國的極右，配合起來攜手鬧事，恢復冷戰

，則這個地球村就永無寧日，我華族要想

轉型翻身，恐怕也就遙遙無期了。極左極  
右，都是萬惡之源，此吾之所以憂心忡忡  
也。所幸此一左右攜手的局面，終於半途  
而廢。天相中國，是我祖宗之有積德也。  
今細讀謝子新著，思往事，感流年，大江  
東去水涓涓，吾能不感慨系之也？

聖文

叢書

# 無所不談札記

邵鏡人 著 定價新台幣壹佰捌拾元

本書係邵鏡人教授繼同光風雲錄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  
有：無所不談札記、憶昆明、一代學人柳詒徵、項羽新傳、感  
懷于右任先生、袁世凱的悲劇、民初政壇秘辛、蜀中遺老趙熙  
、五卅慘案回憶錄、丘逢甲之忠義與詩才、清代江蘇兩賢哲、  
梁鼎芬的風範、近代兩位奇人譚嗣同與唐才常、天才詩人黃仲  
則、樊增祥與易順鼎、王國維其人其學、民主運動的新階段、  
一代學人陳含光、南吳北齊兩畫家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  
歡迎讀者購閱。定價新臺幣壹佰捌拾元，中外訂戶八折優待祇  
收 一四四元，書款交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  
戶，立即寄書。